

印尼的华人同化政策评析

王小民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同化; 认同; 文化多元; 民族平等

[摘要] 二战后新独立的印尼采取对华人进行同化的政策, 目的是要把当地华人同化成印尼土著, 消灭民族差别。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 其特点是强制同化。这种同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在整体上被证明是失败的。文化多元政策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只有遵循民族平等的原则, 实行自然同化和民族融合才是正确的出路。

[中图分类号] D634.3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5)05-0079-04

二战后, 东南亚新独立国家普遍受到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 认为多民族的存在和差异是国家团结统一的威胁, 于是他们无视国内多民族存在的事实, 加紧推行强制同化的政策, 企图建立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然而, 事实表明, 强制同化政策在东南亚普遍遭到了失败。本文试图对印尼同化政策加以评析, 指出失败的原因和正确的方向。

一 印尼政府的华人同化政策及其效果

印尼独立后, 对非原住民进行同化就一直是印尼民族政策的主题。这里的非原住民所指主要还是华人。虽然印尼华人不是一个统一体, 可是在许多印尼领导人的眼中, 印尼华人是一个整体, 他们不但控制印尼经济, 而且反对与印尼土著同化, 同时还效忠于外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领导人对印尼华人的看法,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印尼政府对华族的政策。印尼政府对华族政策的特点是削弱印尼华人的经济力量, 并且把当地华人同化成印尼土著。然而, 由于客观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的限制, 这些政策往往与“同化”的精神有别^[1]。印尼同化非原住民的目标是什么呢? 苏加诺在 1962 年 2 月表示: (1) 殊途同归, 就是由目前“五花八门”的现状, 引导到“完全统一”; (2) 要强调“少数”的民族并不是一个民族, 因此必须通过同化于印尼民族的肌体来消除相互隔离的状况; (3) 在印尼人民中不应该有“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别^[2]。

1978 年, 印尼颁布的《国家大政方针》指出: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和统一, 应该在生活各个领域加强民族同化事业。”之后颁布的《同化宪章》对这句话做了解释: “所谓同化就是指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文化表现的不同集团, 变成为和谐的有意义的社会整体, 即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过程, 对‘华裔’印度尼西亚公民来说, 同化

意味着各个华裔被吸收到单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中来, 使原来具有自己特点的集团不复存在。”^[3]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负责执行方案的人员中各有各的解释。如有的人理解为: 已经改名换姓; 在家里不再使用外国语; 不再做生意; 已经与当地原住民通婚; 信奉伊斯兰教等等^[4]。印尼同化华人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消除华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 来达到消除华人在印尼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并防止华人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中成为“第五纵队”的可能, 最终达到“同归”——解决少数民族问题^[5]。

苏加诺时期对华侨华人的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 苏加诺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印尼华人社会, 大力争取印尼华人社会的支持, 力图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 在陆军、右翼势力、渴望发财的民族商人的强大压力下, 他采取一系列排华措施。在苏哈托时期, 华人只扮演两种角色, 一是摇钱树, 一是替罪羊。

在制定和执行印尼政府对华人政策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偏见和怨恨情绪, 部分地来自印尼人民在几个世纪中在本国被剥夺了基本社会权利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除了不幸遗留下来的这种优越感和自卑感以外, 还有疑惧和敌对情绪, 特别是在日本占领和印尼革命时期所发生的种族间的斗争所引起的情绪^[6]。华人的角色, 无论其政治倾向、实际的经济状况如何, 迁居印尼的时间长短, 常常被定位为根本利益与原住民相异的“富裕的外来民族”。他们的形象更多的是与荷兰人联系在一起, 因此不难理解, 当原本为荷兰殖民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逐渐转移到原住民手中, 华人和原住民之间没有实现新的融合^[7]。长期以来, 印尼一部分军界、政界及商界人士认为, 华侨华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他们对“自己祖国的忠诚是永远不能磨灭的”^[8]。

印尼实行同化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强制。印尼政府认为成功的同化首先应依靠思想意识的转换, 而转换思想意识

[收稿日期] 2005-05-24

[作者简介] 王小民,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讲师, 在读博士生。

的最有效手段在于教育,因此同化应该从教育开始,并据此在实践中对华人开办的中文学校做了种种限制^[9]。在经济领域,印尼政府同样实行强制措施,甚至排斥和打击。苏哈托上台初期,仍继续对华侨华人经济实行打击、限制措施,后来逐步认识到利用华人资本和经验对发展印尼经济的重要性,改变了苏加诺政府一概排斥华侨、华人资本的做法,实行又利用又限制的方针^[10],以便最后将华人经济纳入印尼化的轨道。为达到华人同化的目的,印尼政府还实行了其他很多强制措施:如强迫改名换姓;强迫封闭华文报刊;在身份证上记上特殊符号;解散华人社团;禁止华人过传统节日;禁止中国文化习俗。印尼政府认为,华人坚持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习俗不符合国策,因而于1967年发布命令,指出:“华族宗教、信仰和习俗起源于他们祖宗来的地方,它们的各种表现能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挠人民的正常发展。”^[11]

同化效果如何?一种观点认为,苏哈托政府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达到了一定效果,除了国籍归化、政治和经济认同以外,大多数华人都长期受到当地教育,在思想上已经形成对印尼民族的认同感,尤其是中青年华人、华裔。他们即使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显现不出与原住民有何不同之处,可以说昔日的华人社会基本已经不复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华人社会仍旧客观存在,华人虽然已经成为印尼公民,但还远没有从心理上、文化上、宗教上被当地民族接受,客观上他们还有华裔、华族的意识,还有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同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2]。1990年,印尼内务部长拉迪尼批评华人说:“华人同化于印尼社会的步伐缓慢,华人的思想态度并无多大改变。”^[13]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华人已经加入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在政治上忠于印尼政府;许多人已经改名换姓,使之印尼化;还有许多人信仰了伊斯兰教;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的很多华裔对中文已经不会讲、不会写、不会读了;相当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印尼人了等等。这些现象的确可以说明,印尼的政策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使绝大多数华人认同印尼。但这些并不能表明印尼的同化政策取得了成功,因为印尼民族政府是想通过同化来消除华人原先的民族特征,使之成为印尼民族的一部分,从而达到最后的目的“回归”——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以此来衡量,显然距成功尚有非常遥远的距离。现在华人仍然可以随时感觉自己还是华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或告诉华人的身份和华人问题的存在。印尼公民尤努斯也认为,华裔很少已经全面同化(感到真正成为印度尼西亚人,并且被纯印度尼西亚人完全接受为原住民)。多数人可能仍然处在同化进程的开端,而剩余的人则由于传统及“与祖国的文化关系”而难以被同化。一般而言,新客难以被同化,而已经土生化的华人实际上倾向于适应当地环境^[14]。

二 同化与文化多元化

从理论上讲,同化是指两事物变得相似的一种过程,

或这一过程的终结状态,是以消灭异体的存在为终极目标^[15]。同化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两种类型。自然同化是指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一方民族完全自然地、自愿地接受另一民族的特征而变成另一民族的现象。它是一个长期的自然选择、自然接受和自然适应的过程。它与强制同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采用强制手段,是否凭借特权或暴力手段来实现同化。暴力同化是不平等的,是一种歧视和压迫,它违背了被同化民族的愿望,必然会造成民族隔阂、抵抗和冲突,恶化民族关系,甚至激起被同化民族激烈而顽强的反抗,从而更促使被同化民族以千百倍的努力保存自己的民族特性^[16]。

民族之间的同化,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一种方式,而民族矛盾是由民族特点、差别构成。华人的文化习俗,对于华人是有价值的,但它难以成为华人与其他民族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在华人同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呈现出不同民族文化共存的现象,但它并不是和谐的形式,而是包含着不同文化冲突与代间隔阂的困扰^[17]。

一些人认为,多元文化将是解决印尼华人问题的出路。同化政策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并不是成功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放弃了过去采取的同化政策,转而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种政策保证国内各个民族有平等权利和机会,允许保留文化传统,推行多元化文化教育政策,目标是建立平等、多样性和统一社会,因而能够取得成功。在印尼,华人加入当地国籍并不等于加入当地族籍,国家认同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华人的语言、文化,而且语言文化认同比起政治认同要缓慢得多。只有承认现实,尊重各民族平等权利,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才能最终妥善解决华人问题^[18]。但多元文化政策也有其问题^[19]。文化多元论对移民过程产生的传统流失与所吸收的新文化因子的影响也估计不足,也没有考虑到阶级和现实社会地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20]。由此可见,多元文化论虽然比强制同化论具有优越性,但它也有致命弱点,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问题,其伸缩性很大,完全以多数民族或统治民族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仍然解决不了华人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基本人权问题^[21]。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有违反社会正义的可能,因为不同文化未必皆处于平等地位(至少有强势与弱势之别),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多元是通向自然同化的一座桥梁,文化多元是“短期行为”,而自然同化是“长期行为”^[22]。多元化政策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绝对强大,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不可能对其统治地位提出挑战的前提下才可能执行^[23]。在东南亚,华人所占有的财富比其在人口中的比例要大得多。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感到经济力量强大的华人集团对他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苏哈托讲到,华人资金除有建设印尼的作用外,还存在另外两种可能,他们利用资金来扰乱我们的经济,或者在一些日子将它转移到国外,而实际上,我们的建设需要他们的资金^[24]。

三 同化能够取得成功吗？

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华人已经在不同的国家里形成了独特的华族，他们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渊源，华族作为一个共同体，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不会消失。

亨廷顿认为，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各文明之间，是因为根植于人民认同的差异和认同受到威胁。这样的冲突可能发生在国家间也可能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25]。海外华侨华人在对待异族文化的态度方面，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1）同化型；（2）排斥型；（3）边缘型；（4）融合型或整合型^[26]。

目前大多数华侨已经加入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华侨社会的政治认同问题。但大部分华人在文化上仍然认同于中华文化。这一点引起不少东南亚（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原住民的猜疑、戒心甚至不满，认为华人继续在文化上认同于中华文化，说明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因此他们主张也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而他们提出的最主要方案就是对华人实行全面同化，甚至包括伊斯兰教化和强迫通婚^[27]。他们认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两者应该同步进行，二者不可分割。原住民一般仍然怀疑华裔以及他们对新国家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忠诚。但对于华人伊斯兰教化的主张，舆论界反应不一。许多华人不肯信仰伊斯兰教，或宁愿信奉基督教，当然，也有一些华人改奉伊斯兰教。就印尼原住民而言，许多人欢迎华人改奉伊斯兰教，但也有一些人对华人大批改奉伊斯兰教不以为然，强调要注意质量，并指出有些华人的入教动机可能不纯。国外学者对此看法也不一样。华人伊斯兰教化不可能成为解决印尼华人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华人与原住民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

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海外移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加拿大华人李晟文认为，文化身份是相对稳定的，也是鲜明的，但当因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以及战争等原因造成不同文化的民族会因不同文化间相互作用、影响、渗透与融合而变得含糊不清，并出现更新。这种变化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痛苦的过程^[28]。因此，海外中华文化的变异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变异的速度、深度、广度和趋向取决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华人顽强地保持自己的特点，其动力主要在于文化成熟。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成熟的文化时时在人们心底唤起历史的记忆。华人属于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较易于通过族内通婚来保持自己的血统。土著或统治民族对华人同化的压力，也就在于他们原本是此地的主人或占统治地位^[29]。为什么印尼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强制同化政策，然而却常常事与愿违？其原因在于以下 4 个影响华人同化的关键因素：（1）通婚因素；（2）经济因素；（3）国家政策因素；（4）国际因素。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

存在，印尼政府的强制同化政策遭到了失败^[30]。

在保持本民族某些文化特色的情况下，与主流民族实行文化融合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选择。文化融合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文化特性，而是相互吸收对方的优良特性，彼此取长补短，企图通过强制的手段来消灭具有特色的、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任何做法都是种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念，很难将它们连根拔除或彻底消灭。文化融合是一项双向的事业，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够实现。

印尼人西斯沃诺强调，通过尽可能广泛的私人交往和深入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原住民必将能够更加深入理解非原住民少数民族的真实思想感情。而非原住民方面，也应该更加主动地深入了解原住民的思想感情。印尼原住民经常指责华人社会具有排他性，但是，印尼原住民对华人社会也存在排他性，例如，在实际社会中，华人在持有身份证、受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与原住民不同的待遇。有的地方，某些原住民人士公开声称对华人抱有恶感，不信任感，并表示不欢迎华人加入印尼民族大家庭，显然是赤裸裸的排他性^[31]。

西斯沃诺还指出，印尼华裔的同化问题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由于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政治信仰、优越感等方面同原住民存在着许多差异，如果没有向同化方面作出特别的努力，华人集团是很难同原住民同化的。所谓同化当然不仅意味着生物学上的同化或只限于改名换姓，而更重要的是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同化，以及通过通婚的家庭同化。应该通过积极的同化，采取主动行动。西斯沃诺强调印尼政府和整个原住民社会在处理华人问题上要友好，讲究实际，不应该意气用事^[32]。

在开放的现代社会，民族认同不尽是与生俱来或由社会规定的属性，个体意识和选择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个体选择不选择某种民族认同，最终与其根据个人所做出的权衡与关。国家制定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政策、法规，其主旨也不是为了固化民族界限，而是为了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民安身立命和选择个人认同，以提供制度保障^[33]。

文化融合需要一个和平、友好、善意、和谐的环境和气氛。排华舆论、民族歧视政策、绑架、排华骚乱，不仅无助于华人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而且必将延缓文化融合的进程，并使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急剧恶化和陷入绝境。若印尼政府不改变其歧视政策，印尼华人也难以把印尼当作长治久居、落地生根的地方。排华运动固然常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但那背后的重要因素却往往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解决^[34]。

结 论

华人在多大程度上同化于当地社会并不是印尼政府的

一纸命令就能解决的,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华人所在国主体民族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构成了对少数民族同化的压力。由于历史上错综复杂的许多因素,荷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别有用心野心家、阴谋家、政客煽动的,华侨华人与印尼原住民之间存在误解、偏见、不相适应、矛盾、摩擦和冲突,这些问题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决。印尼政府的华人同化政策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印尼政府的错误政策,使得华人同化的进程缓慢,它是一种强制同化,往往措施的实行效果与初

【注

[1] 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25页。

[2] 郑仁良:《印尼华人同化中伊斯兰问题初探》,《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1-2期。

[3] 郭建议:《同化方案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情况》,《罗盘报》,1982年8月6日,转引自周南京、梁英明等《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11月。

[4] 王福涵:《土生华人的同化》,《明星周刊》,1960年2月27日,转引自周南京、陈文献等《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6年12月。

[5] 王福涵:《同化与政治宣言》,《明星周刊》,1960年4月2日,转引自周南京、陈文献等《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

[6] 威廉·斯金纳:《印度尼西亚少数民族》,转引自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90页。

[7] 杨晓强:《印尼原住民华人观浅论》,《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1期。

[8] Frank B. Weinstein, *Indones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ilemma of Dependence*, New York: Cornell U. Press, 1976, p. 121.

[9] 萧玉灿:《解决华人的经验教训》,《五个时代》,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2年。

[10]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华侨研究会编著:《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11] 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第35页。

[12]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历史论丛》,1991年,第5页。

[13] 郑仁良:《关于印尼华人财团引起的争议》,《东南亚研究》,1992年第2期。

[14] 周南京:《一个印尼华裔公民的日记读后》,《南亚东南亚评论》,第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5]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历史论丛》,1991年,第10页。

[16] 张玉安:《华人同化政策在印、马的事实及未来趋势》,魏维贤、张玉安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

[17] 刘权:《民族立场的差别对华人同化的影响》,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华人研究》(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18]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历史论丛》,1991

年,第9页。

衷适得其反,对印尼国家也带来不利的影 响,只有自然同化才是解决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最理想的方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与当地民族的融合与自然同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华人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必须融入当地社会。但也应该指出,不时发生的反华骚乱,以及印尼政府的强制同化措施,实际上将会延缓甚至破坏自然同化的进程^[35]。任何国家在制定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时都应该遵循民族平等原则,违背这个原则,任何形式的强迫同化都是不会成功的。

释】

年,第9页。

[19] 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169-172页。

[20] 庄国土:《多元文化或同化: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与东南亚华族》,《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2期。

[21] 周南京:《风云变幻看世界》,南岛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22] 谭天星:《华人同化问题:它的理论与实践——周南京教授访谈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3] 刘权:《民族立场的差别对华人同化的影响》,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华人研究》(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24] 苏哈托自述,德威帕雅纳、拉玛丹执笔,居三元译《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2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26] 周南京:《风云变幻看世界》,南岛出版社,2001年,第21-22页。

[27] 周南京等:《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

[28] (加拿大)李晟文:《有关文化身份的思考——从〈我到底是谁〉一文谈起》,《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6月26日第9版。

[29] 刘权:《民族立场的差别对华人同化的影响》,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华人研究》(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30] 张玉安:《印尼华人同化及其前景》,《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5期。

[31] 毛利:《厌恶华侨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日本《朝日新闻》,1982年11月23日,转引自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初探》,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华侨华人历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5年)。

[32] 周南京:《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华人同化观——评价西斯沃诺的〈公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3] 张海洋:《在开放中守护传统——斯洛文尼亚的民族和民族工作》,《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34] (美)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35] 周南京:《一个印尼华裔公民的日记读后》,《南亚东南亚评论》,第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责任编辑:张明亮】